

(1909~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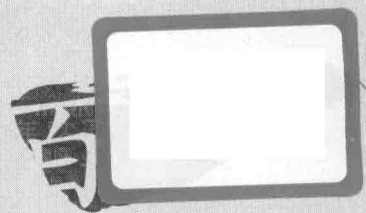
谢林◎主编

陕西省图书馆馆史

上

SHANXI SHENG TU SHU GUAN GUAN SHI

陝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



百年陝圖

陝西省圖書館壹佰周年慶

1909-2009

(1909~1949)

谢林◎主编

陕西省图书馆馆史 上

SHAAN XI SHENG TU SHU GUAN GUAN SHI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省图书馆馆史(上、下)/谢林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736-671-3

I. 陕… II. 谢… III. 省级图书馆—文化史—陕西省
IV. G259.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8051号

陕西省图书馆馆史(上、下)

谢林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670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978-7-80736-671-3

定 价 56.00元

网 址 WWW.sqcbs.com

序

陕西省图书馆曾编过两次馆史。一次是在武复兴任馆长期间，为庆祝本馆成立 80 周年编写的《陕西省图书馆馆史（1909—1989）》。这是本馆的第一部馆史，也是我国最早的省级图书馆馆史之一。该《馆史》由当时馆内退居二线的周广庆、李鼎铭、王伯权、许力军 4 位老同志完成，全书 22 万字，内文分“建置与沿革”、“馆舍变迁及建设发展”、“机构建设与人员编制”、“八十年来藏书建设综述”、“读者工作今昔”、“为本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研究辅导工作”等六章，另附“陕西省图书馆纪事（1909—1987）”。限于当时的条件，该《馆史》的建国后部分记述尚称翔实，建国前部分则十分简略，只占全文中的两万余字，且在很多方面未作翔实考证，存在一些失记、误记之处。从内容上看，该《馆史》名曰“史”，却未能反映本馆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丰富背景，因而仍只是一部“志书”。该《馆史》于 1989 年 4 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再一次是在马民玉任馆长期间，为庆祝本馆成立 90 周年编写的《陕西省图书馆纪事（1907—2000）》。这本《纪事》主要由张鼎钰、周永兴、张继儒、李乃良等 4 位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完成，主要是对前《馆史·纪事》部分进行了重新考订，并将记事内容补充到 1997 年，于 1998 年底完成，当时并没有出版。其后，鉴于本馆新馆舍即将落成，又由孙红侠、尚庄补充了 1998—2000 年间的内容，于 2001 年 9 月以内部资料的形式面世。全书共 15 万字，以依年系事的形式，记录了本馆建馆九十三年间的发展变化，然而建国前部分仍然补充纠正不多，使全编有头重脚轻的感觉。

时间转眼到了 2009 年，本馆又面临建馆 100 周年的重大庆典，修订馆史的话题被再次提起。鉴于前编的《馆史》存在的缺憾，经馆务会议研究，决定重新编写一部名副其实的馆史。馆内首先成立了馆庆办公室，由馆总支书记马民玉任主任；并成立馆庆系列丛书编写委员会，由馆长谢林任主任；馆庆办下设馆史编写

组，由梁经旭、尚庄、孙红侠、姜妮、陆路、强颖、王岚等同志组成，由梁经旭同志任组长。编委会经过多次会议研究，确定了馆史的撰写原则，即严格遵照历史事实，用史实说话，完成一部具有史料性、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的陕西省图书馆馆史。

根据编委会决定，梁经旭撰写建国前的 1909—1949 部分；姜妮撰写建国初至文革的 1949—1976 部分；尚庄撰写改革开放后的 1977—1989 部分；孙红侠撰写 1989—1999 部分；陆路、强颖、王岚合写 1999—2009 部分。从 2009 年初至同年 4 月，各部分初稿相继完成。经馆务会议对书稿审定后认为，建国前部分的撰写较为成熟，而因限于时间关系，对建国后部分内容的重新修正已不可能，因此决定将已经完成的书稿，分为《陕西省图书馆馆史（1909—1949）》和《建国后的陕西省图书馆（1949—2009）》先行出版，待馆庆活动过后，再对建国后部分重新撰写。基于某种技术上的原因，交付出版社后，编委会又研究决定，书名统一用《陕西省图书馆馆史》，1949 年以前为上册，1949 年以后为下册，在馆庆活动结束后，下册再重新撰写，以期与上册相统一。

历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时空演进过程，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也不能例外，它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它所处时空条件下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推动与牵制，因此，要揭示某一行业或其局部的发展史，同样离不开它所处时代或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物等诸多方面的具体因素的影响。基于这种考虑，本编《馆史》采取了以时间顺序为纲，以对陕西省图书馆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划分章节，旨在让阅者通过这些叙述，能够了然陕西省图书馆之所以创办、停滞、发展，以及有所作为的原因，使人们了解到一个真正的、丰满的、只属于陕西的一个省立图书馆的发展全过程。

遵照编委会《馆史》要用史实说话的原则，本编《馆史》严格依照史料记载



展开论述，严格执行“不溢美”、“不衍功”的治史原则，做到言必有据、据必确凿。在肯定一些有良好社会声誉的人物为图书馆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不因某人在历史上的不良作为而回避其曾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有过的积极作用。严格做到了依照史料，客观记述。

遵照《馆史》应具有知识性、可读性、学术性，不但要使研究图书馆的业内人士可读，也要使一般的读者可读，更要使从事文史研究的专家可读的要求，本编《馆史》除真实记述陕西省图书馆的发展沿革外，还注重了对与图书馆发展有关的社会事件的了解与研究，把图书馆放在了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下来记述，使阅者通过这些记述，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图书馆所处的背景，明白其之所以进步、停滞、困顿的原因所在。通过这些记述，阅者也可以了解到陕西省行政区划的变迁，西安市最早的建立时间与缘由，大革命期间陕西省图书馆的进步作用，西安建国前有几所公园及其与省图书馆的关系，省图书馆为何几次更名，镇馆之宝《磬砂藏》和《古今图书集成》因何入藏省图书馆，西安何时建立电厂和省图书馆何时安装电灯、电扇，西安碑林怎样划归省图书馆又于何时划出，省图书馆和西北联合大学合办省立西京图书馆城固分馆的始末，国民党的几次币制改革对社会经济和图书馆造成的恶劣影响……为了使非图书馆专业的人士了解图书馆在中国的发展史，本编《馆史》还专门在绪言中对我国古代的信息记载与存储，和古代图书馆的产生源流做了较为详细的考据与论述。其中在关于仓颉造字问题的探讨中，首次提出了仓颉之所以被历史认为是文字的发明者，并不是他造了多少数量的刻画符号，而是他是第一个把可以通过鸟兽蹄痕辨别不同动物的认知，和通过传递这种认知信息的声音语言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到启发，第一个从主观上认识到规定各种不同划痕符号读音的意义，并依照这种思想，创造出了形音义统一的汉字系统。也就是说文字的发明不只是发明了多少刻画符号，而是一种思想，

是一种当刻画符号有了一定积累后产生的从量变到质变的思想飞跃，仓颉就是完成这个思想飞跃的人，因此，他当然是中国文字的发明者。

要完成这样的一部馆史，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劳动的，这不仅需要详细了解本馆的发展情况，也要了解和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曾对图书馆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为了做到这些，梁经旭同志查阅、研究了数百万字的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使得这部建国前的《馆史》得以较好地完成，使原本含混不清的史实得以澄清，使前编《馆史》中的失误得以纠正，也使得本馆发展过程中的变迁脉络清晰，进步与困顿一目了然。还使人们通过本编《馆史》，可以读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空白，了解到陕西省和西安市在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被遗忘的重要细节。

为了补充文字叙述的不足，本编《馆史》通过大量的照片资料和图表对此进行了弥补。另外还通过《建国前陕西省立图书馆馆长考录》、《建国前陕西省立图书馆职员考录》、《建国前陕西省立图书馆经费考录》、《建国前陕西省立图书馆大事记要》4个附件，对不便文字叙述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使得本编《馆史》的内容更为充实和丰满。

作为对图书馆史撰写方式的一种探索，本编《馆史》肯定有很多的缺失与不足，我们在希望这部《馆史》能给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增添一些色彩外，也衷心地期望全国的图书馆同人和图书馆史专家，以及本省的专家学者、广大读者能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使我们下一步工作能做得更好。

谢 林

2009年7月



目 录

绪 言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信息记载与存储	1
第二节 我国古代图书馆的萌芽	6
第三节 陕西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中的地位	9
第四节 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	11

第一编 建国前的陕西省图书馆（1909—1949）

第一章 清末的陕西图书馆（1909—1911）.....	19
第一节 陕西图书馆的创建过程	19
第二节 清末陕西图书馆的馆长、职员、业务及其他	28
第三节 小结	35
第二章 袁世凯任总统时的陕西图书馆（1912—1916）	36
第一节 西安反正和辛亥革命后的陕西图书馆	36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馆长毛昌杰和朱先照先生	40
第三节 从梁府街到南院门	43
第四节 任职短暂的周丕绅和孙小眉	49
第五节 小结	50
第三章 高树基任馆长时的陕西图书馆（1917—1927）	53
第一节 三家合并的陕西图书馆	53

第二节	李根源省长对陕西图书馆的贡献	55
第三节	1917 年陕西图书馆的各项规则及服务概况	62
第四节	1917 年前后陕西图书馆的人员编制及机构设置	66
第五节	1917 年后的陕西局势	68
第六节	刘镇华和陕西图书馆	69
第七节	1924 年的《陕西图书馆章程》.....	79
第八节	陕西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活动和刘镇华“围城”	83
第四章	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图书馆（1926—1927）	87
第一节	大革命前后的陕西局势及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	87
第二节	新改建的陕西省立四三图书馆	89
第三节	从北区小图书馆、大钊图书馆到省立平民图书馆	91
第四节	省立中山图书馆被迫焚毁革命文献	92
第五章	冯玉祥国民军主陕时的陕西图书馆（1927—1930）	99
第一节	1928 年后的陕西社会教育规划和西安社会教育设施兴建	100
第二节	省立平民图书馆与西安的莲湖公园	103
第三节	中山图书馆与民众公园的兴建	105
第四节	1928 年后的陕西省立四三图书馆	110
第五节	三家省立图书馆与陕西的平民教育运动	111
第六节	镇馆之宝——宋元版《平江府磻砂延圣院刊大藏经》和清武英殿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入藏	114



第七节 陕西图书馆与中华图书馆协会	120
第六章 杨虎城将军主陕时的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1931—1933）	124
第一节 三所省立图书馆的重新改组	125
第二节 1931 年后的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概况	128
第七章 张知道任馆长时的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和 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1933—1938）.....	136
第一节 邵力子先生和陕西的社会教育事业	136
第二节 参与全省的图书馆建设，陕西省立图书馆担当事业领头羊	138
第三节 1933 年后的陕西省立图书馆业务工作	143
第四节 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更名为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	151
第五节 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的业务工作	153
第八章 抗战初期的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1938—1939）	160
第一节 刘振支馆长和馆藏珍贵图书、古物的疏散运藏	160
第二节 线润民馆长和西京图书馆战时分馆的筹建	171
第九章 康耀辰任馆长时的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1939—1944）	175
第一节 西京图书馆南院门馆本部及杜曲阅览处工作概况	175
第二节 康耀辰任馆长时的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城固分馆	180

第十章 董建平任馆长时的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	186
第一节 历史博物馆从省立西京图书馆划出	186
第二节 抗战后的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城固分馆	188
第三节 抗战后的省立西京图书馆	189
第十一章 从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到陕甘宁边区西安图书馆	194
第一节 退出历史舞台的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	194
第二节 西安解放和军管会接收西京图书馆	195
第三节 建国后第一任馆长梁午峰先生和新改组的陕甘宁边区西安图书馆	196
第四节 陕西省通志馆合并入陕甘宁边区西安图书馆	201
第五节 人民教育馆、图书馆、历史博物馆三馆馆藏的分类调整	202
第六节 结语	204

附 录:

附 1: 建国前陕西省立图书馆馆长考录	206
附 2: 建国前陕西省立图书馆职员考录	215
附 3: 建国前陕西省立图书馆经费考录	229
附 4: 建国前陕西省立图书馆大事记要	238



绪 言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信息记载与存储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远在史前时期，在我国广大的南北地区，就有了新、旧石器和黑陶、彩陶的制作以及农耕、渔猎文化的出现。先祖们为了使已有的生产、生活经验得以推广和流传，逐渐发明了文字，用以记载这些文化信息。这些信息先是被记载在各种载体上，后来逐渐形成了专用的载体，通过积累，形成了文献，再由于利用和保存的需要，出现了管理这些文献的人员和机构，于是人类最初的图书馆出现了。图书馆机构的产生，使得人类能够将自己继承和萌生的思想智慧得以保存并一代代传递，正是这种传递，使得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得以保持数千年之久的凝聚、生息与繁衍，使得人类社会逐渐走向光明的彼岸。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图书馆产生的根本前提。早在文字产生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开始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来藏储信息。《易·系辞》中说：“上古结绳而治。”考古调查也证实，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过去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还会一直沿用。这种用于记事的“结绳”，就是我国先民最早藏存信息的方式。这里的“绳”就是信息载体，绳上的“结”记载的就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件信息，这个绳结，也应该是“结”这个字最古老的本义。这种保存信息的方式，伴随着早期原始文字的产生而被取代，古人称为“易之以书契”。这话就在前引《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的文字的后面，全段文字为“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取诸夬”就是“取之于夬”，“夬”音 guài，是《易经》六十四卦之一，字义为“决”，在这里表示通过占卜的卦象符号来决定百官的治理和对民情考察的认识。这可以说是关于先祖使用文字治理国家的最早记载。但这段话除了告诉我们这一条信息外，还告诉我们，写这段话的《易·系

《系辞》作者是把这种占卜符号当作文字来认识的。一般来说，人们都是把卦象和卜辞区分来看待的，把卦象看作符号，把卜辞看作文字，而在这段话里，作者把“夬”的卦象直接确定为“书契”，并指出后世圣人曾用它治理国家，这实际上就是认定这种新的信息记载和存储方式就是一种早期的文字，后世圣人通过它的使用，开始了用文字治理国家的新纪元。这一点也得到了后世《易经》研究者的认可。他们认为，在《易》的卦画里，一长横“—”表示的是一个长绳结，一短横“-”表示的是一个短绳结；长横表示有关天的事，短横表示有关地的事……长短横的自迭或互迭，由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表意系统。这种用长短符号来替代结绳的办法，较之以前已是一个质的飞跃，信息记载的方式从打“绳结”升华为“书契”，向发明现代意义上的远古文字迈进了一大步；信息载体由绳子改变为可以刻画书写的任何材质，向书的产生也迈出了一大步。但由于这种“书契”和语言没有直接联系，不能表示具体的物象，也不能替代当时人的声音语言，所以它只能说是文字创设前的又一段暂短的过渡。其实《易·系辞》里所说的“圣人”就是传说中的伏羲氏。据先秦古籍记载，在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有一匹龙马从黄河里出来，身上驮着一幅被称为“河图”的符识；另外还有一只神龟从洛水浮出，背上负有被称为“洛书”的符号，伏羲氏观察这两种图识后受到启发，由此创造了八卦，这也就是前面引文中的“书契”。这种“书契”真正的表意方式已不为我们所了解，而伏羲所画的八卦经后人演绎发展为《周易》，成为我国由先秦流传至今的一部重要典籍，传说中的《河图》和《洛书》，也就成为我国观念上最早的文献。书契的出现只反映了我国文字产生过程中的一段插曲，由于它自身的缺陷，最终又被一种新的方式所替代，这就是文字的产生。

据考古发现，我国远在公元前 5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间的这段时期内，在陕西、青海、山东、河北、河南、上海、浙江等地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遗址的陶片上，就已经产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类似文字的符号。经过考古专家们对已发现的文字符号的研究断定，在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800 年—公元前 2300 年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东莒(jǔ)县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书写符号，可以认为是早于殷商甲骨文时代的我国最早的文字。这正和我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处于同一的时间段。

我国古有黄帝命仓颉造字的传说。先秦典籍和汉代的《淮南子·本经训》、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都有着关于“黄帝使仓颉作书”的记载。《说文解



字·序》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yi 治理），万品以察。”这里的“远”字音 hang，是痕迹的意思。我们可以不讨论文字到底是不是由仓颉发明的，但一定应该注意这段文字给我们提供的文字发明的由头：即先祖们在长期的狩猎经验积累中，已经可以轻易地通过识别不同鸟兽的蹄爪印来辨别不同动物；一个叫仓颉的人由此受到启发，认识到人们既然可以通过经验来识别、分理出不同鸟兽留在地面上的蹄爪痕迹，进而由此识别这些不同的蹄爪印所代表的不同的鸟兽，并且能够用声音语言来传递这种识别信息；那么人们为何不能自己通过给一定的书写符号规定固定的声音和意义，用以区别世间的万事万物呢！我们应当认定，这才是仓颉造字和许多史前文化遗址陶片上留下的刻画、书写符号的不同所在。我们不能说在时间上出现最早的类似文字的划痕符号就是最早的文字；同样也不能说画出那些最早的符号的人就是文字的发明者；因为只有当人们在主观上认识到可以用不同的划痕符号区别不同意义，并用一种规定的声音传达这个符号规定意义的人，才是文字的发明者。同样，造字始祖的认可与否也不是看谁造了多少字，而是要看他是否有一种主观造字的意识和理论。仓颉可能就是第一个通过观察，发现、认识这种理论并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主动造字的人，而在此以前的众多陶片上的类似文字符号可能是一种下意识行为，只是一种个人或小群体的记事标志；而仓颉造字则是一种主观行为，是一种对文字的创造有了一定理论认识和理论要求的活动，是主观上要造出一种能让所有人像通过识别“鸟兽蹄远”而能识别不同鸟兽一样的一种，能识别世间万事万物的符号系统，这才是真正的文字。任何一种伟大的发明都是先要有思想作前导、理论做准备的，仓颉正是首先认识了兽蹄鸟迹可以识别鸟兽，进而发现了创造文字的理论，也许这才是古代先哲们为何没有把画出“书契”八卦的伏羲氏认定为文字的发明者，而是认定比伏羲氏晚出的黄帝史官仓颉为文字始祖的原因。我们不排除仓颉造字是广泛吸收了若干万年来原始先民创造的数不尽的文字符号和图画，但只有对这些文字符号做出统一的意义和读音上的规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字。仓颉可能就是在有了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后，去给众多的文字符号做出规定的意义和读音的人。这正如《荀子·解蔽》篇中所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人类生产、生活、社会活动等等信息才有了被记载、被存储、进而得以流传的真正可能。我们现今了解到的自黄帝以来的文献及文献信息，就是文字出现以后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带来

的福祉。

随着文字的正式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和文献存储也就随之产生了。郭沫若说：“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字，说明了殷商文字和文献存储方式的巨大成熟。以此说推论，虽然殷商以前五百年间的夏代文字和文献存储现在还没有考古实证，但夏代已有成熟的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

夏代产生并拥有了文字记载的文献，也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间接的确定。

首先夏代有自己的史官，留有自己的文献《夏书》和《夏小正》。《汉书·艺文志》著录古史书《世本》中这样说：“《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按现今史学界理解，《世本》是一部记载自黄帝至战国末年帝王世系的通史性史书，其十五篇包括《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及讲姓氏由来的《氏姓篇》、讲古代发明的《作篇》、讲古帝王及诸侯都邑沿革的《居篇》等。如果当时没有史官的记载，这些是很难流传的。另外，《吕氏春秋·先识》篇也有“（夏）太史令终古出奔如商”的记载。有史官就有其职责，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因而后世有《夏书》流传。孔子在《论语》中也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还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的“文献不足”就是在说：不是没有文献，只是文献不够用罢了。关于孔子这段话《礼记·礼运》篇如此说：“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至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对这后一段话的笺注是：“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竹书纪年》中记载：“禹颁夏时于邦国”。《史记·夏本纪》也说：“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这些记载表明，《夏小正》在春秋前已经出现，在春秋时代，夏代人的后人杞国还在使用它，孔子到杞国考察夏文献时，没有得到期望的收获，得到了夏代的历书，后整理为《夏小正》。现见到的《夏小正》全文共四百多字。它是以每年不同月份里比较容易看到的亮星或一些有固定规律的动植物成长、出没变化为指时标志的历书。其经文文句简奥，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为一句。如记正月的“启蜃”，“雁北乡”，“雉震响”，“鱼陟负冰”，“斗柄县在下”等；记三月的有“参则伏”等十四种星象、物像变化；六月则为“初昏斗柄正在上”等；七月则有“寒蝉鸣”等，这些均为经文。在经文后有“传”，为解释性文字，如“雉震响”后的“传”



文为“震也者，鸣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响，相识以雷”等等。《夏小正》是指导当时人农耕、渔猎、采集、蚕桑、畜牧活动的书，书中所反映的有关蚕桑、畜牧、采集、渔猎劳作和马的阉割，蓝色颜料的制作等等，均为首次见于记载。因此《夏小正》被认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书、农书和最早的文献之一。

其次，夏代保存了上古的文献《虞书》。《虞书》和《夏书》，都被保存在周人完成的《尚书》之中。《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古时“尚”通“上”，上古“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所谓《尚书》也就是“上古之史书”。《尚书》记事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 100 篇。《虞书》记载的即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古帝唐尧、虞舜时期的古史。《虞书》能得以流传，应当与夏代的藏书有关。此外先秦古籍中还提到一些夏代以前的文献名称，如在《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提到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据孔安国《尚书·序》中注释：《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伏羲、神农、黄帝是古史中的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古史中的五帝；《左传》引文是写鲁昭公和右尹子革对话时，左史倚相匆匆走过，昭公对子革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史官，他能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子革说：他连秦穆公时期的诗都不能读，怎么能知道更远的呢？虽然从这段对话中我们不能肯定昭公提到的这些文献当时是否留存，但至少可以说明，春秋时还有关于三皇、五帝时期文献的名称记载流传，而这些文献名称能得以流传，也应当和夏代的文献藏储有关。通过夏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还有《河图》、《洛书》、《连山》、《归藏》、《仓颉书》以及一些铭文，通过以上情况，可以了解到夏代当有自己的文献藏储。

前面已经提到，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字，已经说明了殷商文字和文献存储方式的巨大成熟。《尚书·周书·多士》中说：“维殷先人，有册有典。”但在殷商灭亡后的 3000 多年时间里，殷代文字和典籍，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第一次从殷墟出土的“龙骨”上发现了一种非籀非篆的奇特文字后，这句话才被证实。此后至今，出土甲骨总数约 15 万片以上。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殷王室日常事务和重大活动的记载，主要是自盘庚迁殷后的第三个商王武丁至殷商灭亡这段时间内九个王室的一些活动记载，但也从侧面涉及了殷商时期的阶级状况、国家制度、农事畜牧、年成丰歉、天文历

法、战争田猎、神祖祭祀、王朝世系等各个方面，反映了殷商社会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甲骨文记录了殷王室成员的生活起居和政事、军事活动，其内容符合古代史官记言、记事的职责，有史的性质，因此这些甲骨文也属于“书”的范畴。

甲骨文的藏存也有一定的规律，从考古发掘来看，甲骨文的收藏属于主观的有意存储，如帝乙、帝辛曾征战远方，每至一地，均频繁占卜，而这些占卜的甲骨都在殷墟得以出土，这属于一种主动的归档行为。从发掘情况看，大量的甲骨或为有时间顺序的存放，或是区分龟甲、兽骨各成一类，体现了一定的分类意识。另外，从出土的甲骨上，还可以看到甲骨来源、数量的记载，还有经手史官的签名，体现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有人认为，甲骨文就是殷代王室档案，因为只有王室档案才会如此管理。在商代还有一些更加正式的官用文书，即商王和王室成员的训诫、诰誓、颂诗等，《尚书》中收入的《汤誓》、《盘庚》等，被史学界公认为商代文献，另外《诗经》中的一些《雅》、《颂》部分，也可确定为商代作品，这些都是在春秋末期经孔子整理编入的。而夏代的《夏书》和夏代保留下来的《虞书》等文献之所以能够得到流传，也要以商代的收藏为前提。至此，我国信息记载、传递、存储的方式已基本完成，我国的社会体制，也开始从古老的原始落后状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

第二节 我国古代图书馆的萌芽

我国的古代图书馆在周代开始萌芽，这就是早期的“史档”性质的图书馆。关于这种图书馆最为著名的记载就是老子曾先后担任周王室的“柱下史”和“守藏史”之职。《史记·张苍传》载：“老子为柱下史。”所谓“柱下史”，即“谓侍立殿柱之下”专门记录君主言行的史官。前面提到，上古“史”为记事之官，“书”即为史官所记之史，这种概念在周时依然沿袭，因而这时的书，仍是史档的概念。《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又载：老子“周藏室之史也”。所谓“藏室史”，《史记索隐·注》载：“藏室史乃周藏书室之史也”，也就是管理周王室藏书处所的官员。这是目前所知道的我国最早的关于古代藏书机构和管理藏书官员的记载。因而老子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但周代的藏书机构并不限于“藏室”，还有其他处所。据《春秋·公羊疏》卷一载：“昔孔子受端门

